

鲁金波 编著

治国诗词 舰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序 言

我国是个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诗以言志、诗以抒怀、诗以美刺，是历代诗人的共识。统治者通过采诗、诵诗、听诗，又可观风观志，了解民情，补察时政。因此，诗歌的社会作用一直被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如《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诗论主张。他说：“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也就是说，学诗是修身处世的起点。诗对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启发和陶冶作用；诗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社会风俗的盛衰与得失；能够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道德修养；诗可以用来批评政治、表达民意；除此之外，还具有事奉父母、君主和增加关于动植物的知识的作用。这一论断是对我国诗教传统的高度概括，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代自武帝开始，儒学昌盛。《诗经》广为传播，注家四起，从而推动了诗歌理论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诗大序》。它在总结先秦儒家许多重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诗乐理论，对《诗经》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时代特色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非常强调诗的教化作用。“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

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於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先秦诗论主张统治阶级应当积极地利用诗乐来教化民众，维护封建道德，巩固统治秩序，以期收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诗大序》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诗歌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主张，并要求诗人们密切关注现实，用诗歌进行颂扬与批评，向世人揭示了诗歌作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武器的功能，表现了积极的进步意义。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社会作用得到空前的发挥和提高。诗人白居易在《策林·采诗以补察时政》中说：“大凡人之感於事，则必动於情，然后兴於嗟叹，发於吟咏，而形於歌诗矣……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他还结合自己的实践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尤其强调诗歌的讽喻价值，因为它反映了国事民生，对从政治国更具有褒贬和补弊救偏的作用。“歌诗合为事而作”，不仅为白居易所领悟与遵循，也是广大诗人长期恪守的准则。汉乐府即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唐代诗人正是遵循了“为事而作”的原则，才使诗歌的普及和鼎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得孔夫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论断变成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成文法。

我国诗教传统源远流长，还得力於封建帝王对诗歌教化、美刺作用的认同，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喜好与倡导。许多帝王不仅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或一定的地位，享有帝王诗人的称誉。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

才大略的皇帝，也是一位诗人。他爱好文学，重视辞赋，“立乐府而采歌谣”，并将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著名辞赋家招致周围，授以官职，从而促进了汉赋的发展，出现了作者辈出的局面。汉魏之际，曹操父子既是政治上的领袖人物，也是公认的文坛盟主。曹操有感于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以乐府旧题反映社会现实并表达了渴望国家统一的愿望，所作诗篇气魄雄伟壮阔，情调慷慨悲凉，为建安风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代帝王如太宗、玄宗、德宗、文宗等都是能诗能文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勤于写作的诗人，在他看来“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对南朝梁陈以来宫体诗风的危害是有所认识的，因而提出了“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的要求。《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小传评介说：“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称赞他的诗歌在唐诗发展中有着“首辟吟源”的开创作用。宋代帝王虽没有出现像魏武帝、唐太宗那样擅长诗文的君主，却大都留意翰墨，特别是长期奉行黜武重文的政策，文人的地位很高，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不仅是文坛上的领袖人物，也都是著名的朝臣。这在宋代以前的文学巨匠中是不多见的。明太祖朱元璋也喜欢舞文弄墨，传说他诗作得很快，往往一挥而就。无论是在戎马倥偬之际，还是高坐帝宫之时，都经常和群臣列坐赋诗，饮酒唱和。清代帝王诗人可远比汉唐皇帝，自康熙起多有御制诗集行世。乾隆皇帝有《御制诗》五集、约十余万首，可谓我国诗歌史上少有的多产诗人。由于他们的喜好倡导，从乾隆初年到嘉庆期间，清代诗坛出现了诗人辈出，诗派纷呈的局面。

帝王诗词，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不仅直接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趣与喜好，还往往反映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一时期的历史状况，是国运兴衰更替的记录，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帝王诗词大体可分三类：一是创业者的情怀。

反映乱世风云，抒发创业建国、统一天下的宏图大志。如汉高祖的《大风歌》、魏武帝曹操的《蒿里行》、明太祖朱元璋的《咏菊花》等；二是守成之君的心声。歌咏盛世的承平，感慨守成的艰辛，表达励精图治的志向。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还陕述怀》、《赋〈尚书〉》、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览〈贞观政要〉》、《黄金台怀古》等；三是末世与亡国之君的悲歌。他们安于逸乐、纵情声色，先以浮艳的辞句表现空虚放荡的宫廷生活，继而悲叹末世的辛酸与亡国后的哀思。如南唐后主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宋徽宗赵佶的《眼儿媚·玉京曾忆昔繁华》等。这些诗词都从不同的侧面为世人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传统的诗教诗歌中，关于为人处世、从政治国的诗词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这些诗词大多出自明君贤臣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之手，是他们立身处世和探索治国之道的经验总结，因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也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吸取其中的精华，必将有助于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即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政治国诗词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抒发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这类作品重在言志抒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安危和民族命运，志在兴利除弊、报效国家与人民。如曹操的《度关山》、《短歌行》，有感于东汉末年官场黑暗、吏治腐败，大批农民破产流亡、饱经患难，而渴望清明的政治局面，故借称颂古代圣贤以法治国、清正廉明、轻徭薄赋、崇俭去奢的德政，表达了自己精勤治国的政治理想，以期召集贤才，共创天下归心的伟业。宋代欧阳修的《宝剑》诗以宝剑自喻，表达了内除奸佞外御强敌的愿望。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矢志平息边患，胸怀当年孙权擒龙射虎的壮志豪情。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慨叹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渴望重振“烽火扬州路”的威风。民族英雄岳飞面对破碎的山河、嚣张的敌寇，怒发冲冠，特别是看到中原沦陷区的父老在金兵铁蹄的蹂躏下辗转呼号后，更加义愤填膺，禁不住仰天长啸，决心重新收拾旧山河（《满江红》）。身陷敌手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和《正气歌》中表达了誓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祸福之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为世人树起了为国为民的座右铭。

勤政爱民，恪守职责。这是从政治国、为官处世的根本所在。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姜太公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都论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明太祖朱元璋“勤于庶政，每临食，匕箸屡废，思得一事即以片纸书之，缀于裳衣”，“临朝则一行之”。他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这些优秀的治国思想和从政美德为广大贤明的官吏所继承，并反映在他们的诗词中。于谦在《昼夜长短》中，深感自己身为巡抚，安民抚军，职责重大，不得不日夜操劳。他多次明察暗访，上疏禀报灾情，为民请命，曾使河南数十万灾民度过饥荒。他“简教厉兵戎，公勤报案牍；诉牒旁午来，剖断不留宿”。只有把公务及时处理妥当，方能用膳安眠。当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降临后，他也因未能庇护好民众而自责，为免除民众的灾难，宁愿自己承受天意的惩罚。他在《入春狂风大作，加以久无雨雪，因以自咎》中写道：“抚巡失政固予罪，窃禄偷安心独愧。愿移灾咎及予职，免使苍生受憔悴。”古人云：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于谦堪为勤政安民的楷模。李刚则以《病牛》为题，心系天下苍生，“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表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牛精神。苏

轼的《答吕梁仲屯田》，表彰了仲伯达在洪水猖獗之际，坚守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急灾民所急，与灾民共患难的壮举，并互勉互励，进行水利设施建设，为民众解除后顾之忧。黄庭坚出任太和知县后，深入偏僻的贫困山区调查，《上大蒙笼》，体察民情，推行新政新法，受到百姓的称道。杜荀鹤《送人宰吴县》，以至诚之心告诫友人，在兵荒马乱之后到吴县赴任，要更多地想到百姓的灾难，关心他们的疾苦；抚养人民的至理莫过于清正廉洁，故应以简朴廉洁自律、以爱民养民为务。宗臣《送张肖甫公奉命督租闽粤》，以西汉循吏抚赈灾民的先例告诫张肖甫，面对贫寒彻骨的百姓当矫诏宽租，救民众于危难之际，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作者以督租为题，以宽租作结，字里行间充溢着忧民安民的深情。与勤政爱民、恪守职责相反的是暴政害民，假公济私，失取枉法。如白居易的《紫毫笔》、唐庚的《讯囚》、沈德潜的《制府来》、郑燮的《私刑恶》等作品，对此进行了剖析。白居易曾经在皇帝跟前任谏诤官三年，由于恪守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大胆地为民请命，而得罪了一些权贵。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一些谏官和朝臣，明明知道一些不法官吏在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明明知道君上奢侈淫逸、为所欲为，却因自身私利而敷衍塞责，不敢直言进谏，秉笔直书。作者愤慨这种失职行为，以紫毫笔起兴，借题发挥，劝诫官吏忠于职守，切勿失职、渎职。

变法革新，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易经·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商鞅从社会实践中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著名论断，为历代革新者推崇。北宋范仲淹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治国之道说，“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同样说明了变法革新的重要。我国古代力主革新的诗人不胜枚举。唐代刘禹锡、柳宗元都是永贞革新的重要成员，他们写了许多反映革新的作品。刘禹锡的《飞鸢操》以比拟手法揭露、鞭挞永贞革新失败后的保守派，虽然占

据朝堂，却无治国之策，仁义之心，不过是一群妒贤嫉能、争权夺势的伪君子。柳宗元的《笼鹰词》则以苍鹰上击长空，风驰电掣、下攫狐兔，凌厉激昂的英姿，歌颂了革新派大刀阔斧的改革气魄，虽遭暂时的失败，终究会“拨去万累云”，翻出新曙光。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宋代的王安石，借评介商鞅锐意变法的政绩，表明了自己推行新法的坚定信念，并向世人揭示了“驱民在信诚”这一最普通的为政治国之道。只有诚实无欺，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变法图强。近代梁启超的《去国行》，慨叹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痛思奋勉，表示甘愿为变法革新事业献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意在奉劝清王朝借鉴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革除弊政。唐太宗李世民的《赋〈尚书〉》和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览〈贞观政要〉》，表现了他们以史为鉴，精勤治国的情怀。李世民酷爱经史典籍，注重汲取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审视现实与自身。“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他读史论政的名言。他常在万机之暇与群臣论古今治乱兴亡。“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披五典”的诗句，表明了他对史书的极大兴趣。读史使他体会到了“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的至理，因而要努力做一个有道的明主，不做淫奢的昏君。他所开创的贞观盛世一直为后人仰慕。爱新觉罗·玄烨在诗中说他从数千年的历史典籍中获知，著名的盛世还数“贞观之治”，由衷地钦佩其息兵戈而修德政，明刑法而空牢狱的历史经验，并告诫图谋私利、争封请赏的皇亲国戚与朝臣，要克己自律、勤于国事，莫作非份之想。杜甫的《蜀相》饱含着敬仰之情歌颂了蜀汉丞相诸葛亮为国事奔波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作者同时也在期盼“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能出现像诸葛亮那样的治世良臣，平息叛乱，恢复国家的安定统一。

明廉知耻，恪守清操。这是为官处世的必备品德。管子曾把廉、耻、礼、义并列，称为“国之四维”。廉耻是讲一个人的道

德修养，“临大利而不易其义”，“不以富贵而忘其辱”，公而忘私，不阿意枉从，只有这样才能正身治国。我国古代许多明臣志士都非常注重保持清廉的名节。屈原在《橘颂》中通过赞美橘树“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品格，表达了他“秉德无私”、“淑丽不淫”的情操。陆机的《猛虎行》说，“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旨在注重身名，恪守节操。于谦则在《无题》中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温饱”。接着，又以贪图利欲的唐朝宰相元载“千载遗腥臊”，勤政廉洁的汉代太守刘宠“死后有余褒”为例，说明名节可以使人千古流芳，而金钱会使人遗臭万年。东汉杨震以却金闻名，赢得了“关西孔子”的好称誉。胡曾有感于此，并针对唐朝末年贿赂公行，人民苦不堪言的社会局面，写了《关西》一诗，盛赞廉洁奉公的杨震，“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以激励朝臣自新、自律、自强。包拯《书端州郡斋壁》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旨在表明他恪守清操，刚正不阿，为国为民除暴安良的决心。他还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以警世人。于谦的《入京》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正气凛然。他还以石灰自比，即使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粉身碎骨，也要为世人留下青白的名声，表达了他甘愿为国为民献身的高风亮节。吴隐之的《酌贪泉》，借伯夷、叔齐表明自己廉洁的品格。由于他率先清廉为政，所属官吏也不敢过分搜刮、刻薄百姓，致使素以贪赃渎职闻名的岭南吏治为之改观。克己节俭、肃贪反奢是勤政治国的重要内容。“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李商隐的《咏史》以历代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讽喻当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这也是为官治国的至理名言。

广开言路，选贤任能。“人治”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长期占居主导地位。国家兴亡，务在得人，已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

共识。因此选才用人是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说，得人者，“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失人者，“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汉高祖刘邦深识其理，以能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人杰”取天下而心慰，以安邦强国乏人而叹惜，“安得猛士守四方”；故而布告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曹操为拨乱反正、成就霸业，接连发布求贤令，同时在《短歌行》中借《诗经》、《管子》中的名句，抒发了求贤若渴、唯才是用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主张“广任贤良，委之以政”。他视魏征为股肱之臣，称之为“人镜”，认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的《望送魏征葬》即表达了与魏征的君臣之谊和对贤才的深切缅怀。明太祖朱元璋视贤才为“国宝”，深知君主没有贤才辅佐，就不能治理好天下的道理。因而在《赠刘伯温》中盛赞刘基运筹帷幄，亡吴灭汉的杰出才能，以及兴邦开国的功勋。爱新觉罗·玄烨有感燕昭王礼贤下士，为振兴国家，不惜筑黄金台，置千金广求天下贤才的壮举，写了《黄金台怀古》，表达了他“治致之道首重人材”的思想，以及“革除积弊，遴选真材”的用人政策。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懂得人才的重要和真正重用贤才。特别是由于贤才大多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往往遭到昏君佞臣的排斥打击。于是又有许多政治诗人发出怀才不遇、遭谗被逐的慨叹。屈原的《离骚》即是遇谗被逐后所作。郭震的《古剑》，托物言志，借宝剑被埋没而抒发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讽喻当朝要珍惜人才，还要善于发现、识别和挖掘那些被埋没的人才。白居易的《涧底松》，以松喻人，抨击了世族把持朝政，许多寒门出身的有才干的人遭排挤、被埋没的现实。王冕的《寓意十首次敬助韵》，愤慨贤臣被黜，小人得势，并指出“忠义在草莽”，“古来王佐才，多在耕钓间”。魏源的《都中吟》直斥科举制度和捐纳制度的腐败，渴望广开言路，多方寻求人才。龚自珍期盼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渴望进行社会变革，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些作品都

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选贤任能对于安邦治国的重要性。

歌颂忠贞诚信的治世良臣，鞭挞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了许多公而忘私、精勤治国、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光辉业绩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因而被人敬仰、向往。与此同时，那些昏君佞臣、贪官污吏也从历史的反面为人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王安石的《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借称颂商周时期的两位贤臣伊尹和吕望因得到明主器重而得以施展才华，功垂千古的事迹，表达了诗人渴望获得当朝圣上的任用与支持，推行变法革新的殷切愿望。屈大均在《鲁连台》中，通过称赞鲁仲连急人所急，为人排忧解难的侠义精神和耻于封赏的高尚品德，抒发了明朝的志士遗民不忘恢复故国的情怀。胡世将的《酹江月·神州沉陆》，歌颂汉初“三杰”辅佐刘邦定天下和北宋范仲淹、韩琦驻守西北边疆，屡败西夏外敌的史实，表达了诗人主战反和的坚定信念。杜甫的《蜀相》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热情歌颂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诸葛亮、孙权，以及战国时期的名将廉颇和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宋皇帝刘裕，抒发了诗人志在平息战乱、恢复统一的老骥情怀。文天祥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盛赞唐代名将张巡、许远以身殉国的壮举，寄托着自己为国尽忠、视死如归的豪迈情怀。诗人开篇明志：“为子死孝，为臣尽忠，死又何妨”。舍生取义的刚肠热血感人肺腑。蒋士铨的《梅花岭吊史阁部》，凭吊南明爱国将领史可法，歌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长存。张维屏的《三将军歌》，歌颂鸦片战争期间为抗御强敌入侵、保卫国土而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陈联升、陈化成、葛云飞，表达了中华民族捍卫主权、同仇敌忾的气概。此外还有周昙的《孙武》、王安石的《商鞅》、宋琬的《冯唐墓》、惠洪的《题李愬画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的《上工部尚书胡公》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诗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及其精勤治国的业绩，催人奋起。

鞭挞昏君佞臣、贪官污吏的诗篇也不胜枚举。李白的《殷后乱天纪》，借历史上的两个无道昏君殷纣王和楚怀王讽刺唐玄宗重用奸佞李林甫等人，抛弃了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梁甫吟》借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鞭挞唐玄宗恣意享乐和败坏朝政的事实；《登金陵凤凰台》吊古伤今，愤慨高力士、杨国忠当道误国。皮日休的《橡媪叹》揭露唐朝末年贪官狡吏肆意盘剥人民，连假仁假义的伪装都不要了。刘子翬的《汴京纪事》痛斥北宋末年的王傅、蔡京等误国奸臣，指斥他们“骨朽人间骂未销”的可悲下场。周德清的《满庭芳·误国贼秦桧》，鞭挞欺君误国的民族败类秦桧，慨叹英雄遗恨千古。刘禹锡的《昏镜词》、欧阳修的《寄生槐》、龚自珍的《伪鼎行》，都是托物言情的政治讽刺诗。刘禹锡嘲讽唐宪宗昏暗不明如“昏镜”，重用宦官，贬斥贤良。欧阳修以寄生槐为喻，抨击依附权贵、作威作福的朝中弄臣和背恩负义、落井下石的伪君子，告诫正直的朝臣当防患于未然，切勿养孽为患。龚自珍以伪鼎隐喻重臣权相和达官显贵，揭露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为那些贪官污吏敲响了警钟。此外还有李贺的《感讽》、范成大的《催租行》、吴伟业的《直溪吏》、沈德潜的《制府来》等，也都从不同的侧面揭露和鞭挞了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的官吏，以诚来者，催人自新。

以史为鉴，谴责社会现实的腐败黑暗。治乱兴衰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因而探究其原因，图谋长治久安之策尤为历代政治思想家和诗人所关注。贾谊曾指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持久而社稷安矣！”诗人之作大多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提出多难兴邦，逸豫亡身的道理，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其中：阮籍的《咏怀·驾言发魏都》，慨叹魏王沉溺歌舞行乐，不理朝政，不知用贤，结果落得国破身死。沉湎酒色、醉生梦死，是许多末世君主的痼疾。诗人发思古之幽情，意在讽谏当朝汲取历史教训，免蹈覆辙。正如清人陈沆所评

说：“此借古以寓今也，魏明帝末年，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奸，岂非百世殷鉴哉。”金陵曾为六朝故都，六代王朝在此相继覆灭，所以历代诗人也多用六朝史事，指陈社会弊端，劝诫君王权臣，表达忧国忧民之情。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安石的《金陵怀古》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忧劳可以兴邦，逸乐必然亡国的历史教训。王安石吟道：“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建都金陵的霸主大多孤身创业，白手起家，他们的子孙却以百城降敌。其原因就在于子孙们一味地追求豪华奢侈，而不知亡国之祸正与荒淫逸乐相伴而来。这一精辟的论断几乎概括了历史上一切国家政权兴衰交替的规律。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则通过批判偏安江南的六朝，谴责了苟且偷安、不图进取的南宋王朝。金陵位居险要之地，本来有着鬼设神施的天险，可作进兵中原的凭藉。然而，竟无人“会识”，反被认作是老天限定的南北疆界，故而六朝君臣偏安一隅，“只成门户私计”。由此讽喻南宋王朝君臣切不可步六朝后尘，只为自己狭隘的私利打算，置国家利益于度外，而当学祖逊中流击楫的英雄气，誓必北伐，恢复中原失地。

还有一些诗词，直接抨击了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如赵壹的《疾邪诗》、曹操的《薤露行》等。赵壹愤慨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更相专权、任人唯亲和轻蔑知识、注重金钱的社会风气，在诗中严厉谴责了趋炎附势的小人高座厅堂、满腹诗书的刚正清廉之士遭唾弃、德才兼备的贤良没于贫困的社会现实。曹操在诗中哀叹国家丧乱，君王蒙难，百姓遭殃；指出君王用人不当，宦官专权；妒贤嫉能，忠奸不分，埋没人才；是导致朝政腐败，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许多诗人所揭示的一条历史的经验教训。

本书是为党政干部编写的，旨在提供一个借鉴历史经验、加强勤政廉政建设的诗词读本。广大干部可在百机之暇，读上一首

短小精辟的诗词，细细品味和反思古代君臣的从政治国之道，丰富自身的修养，从中受到启迪。古代诗词浩如烟海，编者力求精益求精，选择那些具有较多借鉴意义的诗词，以饷读者。同时，为了阅读的方便，除对每篇诗词作了必要的注解外，还对她的内容、意义作了简要的、综合性的解析，供读者参考。倘若读者在掩卷沉思之后，有所获、所悟，编者就算达到了目的。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刘耕路教授、孙乃沅教授欣然为本书审稿，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学识所限，书中肯定还有不少缺点错误，敬祈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年春节

责任编辑 蔡雨龙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吴白桦

目 录

夏 禹：襄陵操	(1)
诗 经：甘 棠	(3)
硕 鼠	(3)
屈 原：国 殇	(5)
哀 郢	(7)
橘 颂	(11)
刘 邦：大风歌	(14)
赵 壹：疾邪诗	(15)
曹 操：度关山	(17)
薤露行	(20)
蒿里行	(22)
短歌行	(23)
曹 丕：至广陵于马上作诗	(26)
曹 植：白马篇	(29)
怨歌行	(31)
三良诗	(33)
阮 籍：咏怀（选二）	(35)
陆 机：猛虎行	(38)
左 思：咏史（选二）	(40)
吴隐之：酌贪泉诗	(43)
陶渊明：劝 农	(44)
咏荆轲	(47)
鲍 照：代出自蓟北门行	(49)
拟行路难（选一）	(51)

魏 征：述 怀	(52)
李世民：还陕述怀	(55)
赋《尚书》	(56)
赐萧瑀	(58)
望送魏征葬	(58)
卢照邻：咏 史（选一）	(60)
陈子昂：感 遇（选二）	(63)
李 显：幸秦始皇陵	(66)
郭 震：古剑篇	(68)
张九龄：感 遇（选一）	(70)
李 颀：古从军行	(71)
祖 咏：望蓟门	(73)
李隆基：送贺知章归四明·并序	(75)
幸蜀西至剑门	(76)
李 白：古风（选二）	(78)
远别离	(82)
梁甫吟	(84)
登金陵凤凰台	(88)
戎 昱：咏 史	(90)
高 适：燕歌行·并序	(92)
杜 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95)
石壕吏	(101)
蜀 相	(102)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 严郑公（选一）	(104)
元 结：舂陵行·并序	(106)
贼退示官吏·并序	(109)
韦应物：观田家	(111)
寄李儋元锡	(112)